

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问道

○○● 王世伟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面向未来的 公共图书馆问学问道

王世伟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问学问道 / 王世伟著.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0
ISBN 978-7-5520-3202-4

I. ①面… II. ①王… III. ①公共图书馆—研究
IV. ①G25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01605 号

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问学问道

著 者: 王世伟

责任编辑: 包纯睿 陈如江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cn> E-mail: sassp@sassp.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龙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 24

插 页: 1

字 数: 391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9 月第 1 版 202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3202-4/G·940

定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我对图书馆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1982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考入了同校的图书馆学系研究生,师从顾廷龙(1904—1998)先生问中国古典文献学。在研究生授课老师顾廷龙、潘景郑(1907—2003)、胡道静(1913—2003)、吕贞白(1907—1984)等先生讲学指导的同时,我开始撰写短篇的历史文献学相关的读书笔记和心得,如《书版黑口说略》(1984)、《版本名称释略》(1984);同时结合研究生论文的撰写,发表了一些校勘学的研究文字,如《论孙诒让校勘的特点与方法》(1985)、《刘向刘歆父子校勘学初探》,这些都可以归为图书馆古籍整理的范畴。2000年,在文化部图书馆司的组织下,我主编了《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任教,结合中文参考工具书的教学和具体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文献学分支的编辑,撰写了一些论文,其中主要论文有《字书、辞书、工具书考略》(1989)、《关于工具书类型划分的若干问题》(1989)、《20世纪上半叶中国年鉴编纂出版论略》(1991)、《中国大百科全书起源考略》(1991)、《论工具书与图书馆》(1991)、《政书初探》(1992)、《〈说文解字诂林〉述略》(1992),这些研究可以归为图书馆中文参考的范畴。1993年,我编撰出版了《中文工具书使用指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之后,顾廷龙先生交给我《尔雅导读》书稿的撰写任务,于是在此后的许多年内,《尔雅》成为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论尔雅与百科全书》(1988)、《尔雅版本考》(1994)、《雅书分类考论》(1996)、《尔雅校点序》(2009)、《关于〈尔雅〉整理点校的若干问题》(2010)等,这些都可以归为图书馆历史文献整理的大范畴之中。关于《尔雅》的研究文字,曾先后出版了《尔

雅导读》(巴蜀书社 1990 年版)、《尔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尔雅〉史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年版),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总结。

1995 年 9 月,我调任上海图书馆担任党委副书记,曾先后兼任历史文献中心主任、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社长等职务,先后主管了历史文献、会展讲座、数字图书馆、读者服务、信息处理、中心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人力资源、组织文化等业务和行政管理工作。

从 1995 年至 2010 年的 15 年中,我的研究重点之一围绕图书馆的历史文献而展开。1997 年 10 月,上海图书馆新成立了历史文献研究所,一年多后的 1999 年 4 月,《历史文献》丛刊问世,至 2019 年 5 月,已出 21 辑。我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研究中,侧重历史文献人物和上海图书馆馆藏历史文献的研究,其中主要论文有《馆藏传世孤本明版〈三峡通志〉考略》(1997)、《关于盛档》(1999)、《古籍整理工作的历史回顾与发展趋势》(2000)、《常熟翁氏六世藏书及其文献学术价值》(2000)、《传世孤本南宋明州刻本〈集韵〉初探》(2002)、《〈永乐大典〉保存、研究与传播的过去与未来》(2002)、《论明清藏书家藏书楼在保存历史文献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2002)、《论四库标注之业》(2003)、《论顾廷龙先生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2004)、《潘景郑先生之读书与校书生涯》(2004)、《上海图书馆藏王重民先生手稿提要》(2004)、《古籍目录版本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2005)、《古籍整理应重视祖本、校勘与版本源流》(2005)、《论张元济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2007)、《顾廷龙晚年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2007)等。我将有关历史文献的 60 篇研究文字予以汇编,出版了《历史文献论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此后,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曾组织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我按文库主编要求汇录了自己有代表性的 25 篇历史文献研究文字,成《历史文献研究》一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来新夏先生(1923—2014)为本书写了序言。

从 1995 年至 2010 年的 15 年中,我研究的另一重点,则围绕公共图书馆服务与管理而展开,包括公共图书馆的讲座、展览、数字图书馆、读者服务、文旅融合、职业资格证书、组织文化、服务标准、图书馆建筑、发展战略等,也撰写了一些上海图书馆史的研究文字以及境外参访心得。其中主要论文有《论图书馆旅游功能的发挥》(1995)、《跨世纪图书馆新馆建筑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1997)、《上海公共图书馆发展史略》(1998)、《从“读者第一”到“图书馆员第一”》(1999)、《论徐家汇藏书楼的创建及其变迁》(1999)、《合众图书馆创始考略》(1999)、《论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六大重建》(2000)、《论数字图书馆的特点及其对当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2001)、《论创建适应并促进图情事业发展的组织文化》(2002)、《论图书馆讲座的功能与发展》(2002)、《关于图书馆工作全球化问题的若干思考》(2002)、《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史与服务管理特点》(2003)、《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历史与设计管理服务理念》(2003)、《构建信息无障碍的图书馆服务理念和体系》(2003)、《网络环境下文献提供的实践探索》(2004)、《上海城市发展及图书馆发展的互动作用》(2005)、《致力于优雅社会的新加坡公共图书馆》(2005)、《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文化定位、建筑布局与服务特色》(2006)、《挪威奥斯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给予我们的几点启示》(2006)、《体验图书馆刍议》(2006)、《图书馆展览服务初探》(2006)、《当代图书馆建筑设计中应理性处理的各种关系和矛盾》(2006)、《国际大都市图书馆的共同特征述略》(2007)、《关于加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结构与布局的若干思考》(2008)、《当代城市图书馆的定位与图书馆建筑的软设计》(2008)、《新中国图书馆服务理念与实践 60 年》(2009)、《城市中心图书馆发展若干问题研究》(2009)、《论中国当代城市图书馆的发展与读者群细分服务》(2009)、《主题图书馆述略》(2009)等。2000 年,我将此前的部分研究成果汇为《图书馆学文献学论丛》(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总结之一。同时,结合当时上海图书馆开展数字图书馆的实践,笔者与上海图书馆的诸位同事一起,撰写了《数字图书馆引论》的著作(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2000 年,在整理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我担任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图书馆馆藏历代尺牍整理研究”(00ETQ001)的课题组长,此项目也被列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项目、“十五”国家重点图书、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等,并最终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8 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结合整理工作中的体会,我撰写了《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尺牍文献》的论文(2002),对尺牍文献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2005 年之后,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成为我研究的重点之一。我先后主持了两个前后互联、逻辑相续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为“世界级城市图书馆指示体系研究”(05ATQ001),二为“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

(11ATQ001),围绕这两个课题,曾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先后出版了这两个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世界著名城市图书馆述略》(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指标体系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年版)。此外,这一时期还承接了国家文化部委托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标准研制的课题(2008—2012),撰写了《关于〈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编制的若干问题》(2011)、《〈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编制及其特点论略》(2012)等论文,出版了《〈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应用指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版)。还承接了图书馆职业资格证书的国家重点课题子课题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并围绕课题写了一些论文,如《论中国图书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2003)、《论图书馆参考馆员制度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结合》(2003)、《在我国三大系统图书馆中实施职业资格认证制度面临的问题》(2007)等。

2010 年 8 月,我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所长后,拓展了原来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视野,其中智慧图书馆、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信息安全、专业智库等成为四个新的研究主题。

在智慧图书馆方面,先后撰写了《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智慧图书馆》(2011)、《再论智慧图书馆》(2012)、《论智慧图书馆的三大特点》(2012)、《融合图书馆初探》(2016)、《智慧社会是智慧图书馆发展的新境界》(2017)、《人工智能与图书馆的服务重塑》(2017)、《信息文明与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2017)、《关于智慧图书馆未来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2018)、《论公共图书馆的全域服务》(2018)、《关于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服务重塑的五个问题》(2019)、《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更新》(2019)、《全球大都市图书馆空间设计的发展特点与读者服务》(2019)、《深化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更新的若干问题》(2020)等论文。

在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方面,先后撰写了《上海市中心图书馆的十年发展与未来愿景》(2011)、《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初探(上下)》(2013)、《基于数据信息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分析与展望》(2013)、《构建面向未来的国际大都市图书馆互联网——关于大都市图书馆创新发展的思考》(2014)、《全球大都市图书馆服务的新环境、新理念、新模式、新形态论略》(2014)、《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建设应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创新》(2016)、《新一轮中国城市图书馆创新发展论略》(2017)、《论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2018)、《论公共图书馆的全

域服务》(2018)、《关于公共图书馆文旅深度融合的思考》(2019)、《基于生动实践的中国公共图书馆理论创新——以“我嘉书房”为例》(2019)、《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六大特点》(2019)、《论江南文化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始创与发展》(2019)、《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问学问道》(2020)、《论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包容性发展》(2020)等论文。

在信息安全方面,2013年至2016年,我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与云环境下国家信息安全管理范式及政策路径研究”(13&ZD185)。在研究期间,课题组共完成各类专报20份,发表论文50篇(包括媒体时评文章),主持制定相关国家标准2种,召开国际和全国会议及组织各类学术交流活动16次。作为课题的首席专家,我于课题在研期间和结项之后撰写了一些论文,其中主要论文有《被互联网挑战的时代》(2013)、《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制度的顶层新设计》(2014)、《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2015)、《万物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大趋势——对“互联网+”的多维度观察》(2015)、《大数据的特点与精髓》(2015)、《大数据环境下信息安全交织特征及其政策路径选择》(2015)、《略论网络文化的六重融合趋势及应对策略》(2015)、《以文化的力量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规则体系》(2016)、《论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的新特点与新要求》(2016)、《再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2016)、《信息化具有全域赋能作用》(2019)、《略论信息疫情的十大特点》(2020)等,出版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大数据与云环境下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同时与信息研究所的同事一起,围绕信息学理论前沿,集体撰写了《信息学理论前沿——信息社会引论》一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

在专业智库方面,先后撰写了《试析情报工作在智库中的前端作用》(2011)、《数字网络环境下建大型公共图书馆的必要性——以上海图书馆二期工程建设为例》(2012)、《加强中国特色新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专业智库建设论略》(2016)、《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融合发展趋势及对图情工作的启示》(2016)、《智库之“智”的多重内涵》(2017)、《智库专报五大要素探析》(2017)、《公共图书馆决策咨询工作面临的三大挑战与发展定位》(2018)、《新时代中国特色图情智库新使命》(2018)、《略论国家高端科技智库的功能定位》(2018)、《谈谈智库决策建言的“度”》(2018)、《科研与智库成果选题与思考切入点》(2019)、《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新型智库建设的定位与发展》(2020)等论文,

出版了《专业智库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年版)。

问学问道是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的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辩证思维。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问学问道》一书,汇录了近年来笔者对公共图书馆问学问道的最新思考和研究文字。全书分为“问学篇”“问道篇”“技术篇”“建筑篇”和“文献篇”。其中“问学篇”主要包括科研与智库的选题、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热点鸟瞰、研究治学的方法、经典阅读等内容,“问道篇”主要包括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服务品牌、智库建设、地域文化、文旅融合等内容,“技术篇”主要包括人工智能与图书馆重塑更新、数据驱动与图情教育转型、信息化的全域赋能、“信息疫情”特点等内容,“建筑篇”主要包括全球大都市图书馆的空间设计与文化意蕴、数字网络环境下建大型公共图书馆的必要性等内容,“文献篇”主要包括与顾廷龙、张元济(1867—1959)、刘体智(1879—1962)、李玲璞(1934—2012)等学者相关的文献学故事以及灰色文献和类书文献的研究文字。敬请业界方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世伟

2020 年 4 月 15 日于上海凯旋北路清水湾

前 言

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问学问道,对于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战略性问题,还是一个具有哲学含义的专业命题。对此,笔者试图从问学、问道、学道关系等三个方面来予以讨论和阐述。

一、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问学

(一) 一问“学”字

古文字“教”与“学”原为一字,后分化为两字。学,古文作“𡥉”,在古文字中原属“教”部。《说文解字》卷三教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支从孝。”上施教,故字从支,下所效,故字又从孝。“孝”字从老省从子,所谓善事父母者,子承老也。《说文解字》教部除部首字“教”外,只有一个属字,就是“学”字。《说文解字》:“𡥉,觉悟也。从教,从宀。宀,尚矇也。白声。學,篆文𡥉省。”古文“𡥉”自秦代以后字体去支作“學”,后再简化为“学”。^[1]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注曰:“《学记》曰,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按,知不足,所谓觉悟也。《记》又曰,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人谓之学者,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故古统谓之学也。……尚童矇,故教而觉之,此说从宀之意。”^[2]

可见,“学”字的本义为学习并接受教育而觉悟,主要有两层含义,一为自觉,二为觉人。所谓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广雅·释诂三》:“学,效也。”^[3]《玉篇·子部》:“学,受教也。”^[4]这些解释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学”字所表达的学习并接受教育而觉悟的含义。在教育学习的过程中,在自觉的同时也起到了觉人的作用。《书·商书·说命》有“教学半”的说法,其谓:“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汉孔安国注曰:“教然后知所困,是学之半。终始常念学,则其德之修无能自觉。”唐孔颖达进一步解释曰:“教人然后知困,知困必将自强。惟教人乃是学之半,言其功半于学也。于学之法,念

终念始,常在于学,则其德之修渐渐进益,无能自觉其进。言日有所益,不能自知也。”^[5]意思是说,教是学习的一半,学习在于自始至终念念不忘,这样自己的德之修养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

无论是自觉与觉人,对于面向未来的中国公共图书馆而言,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在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过程中,在服务社会服务读者的过程中,在提高公共图书馆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而感到知不足,遇挑战知困而学以自强,以觉悟所不知,将学习融入服务与管理的全过程,日有所益。通过自觉与觉人,不断提升公共图书馆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把服务读者的过程作为提升馆员服务水平过程,所谓教人乃是学之半也,这就是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学习力的体现,而这也是公共图书馆与时俱进的发展力和创造力的基石和源泉。

(二) 二问学习

就“学”所表达的学习而言,在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发展中,有许多需要把握的理念视角。

1. “学不可以已”

面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环境,身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就公共图书馆人而言,无论你原来是大学专科或本科毕业,还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甚至是博士研究生毕业,无论你是评上了助理馆员,还是副研究馆员甚至是研究馆员,可以吃你的专业深造和学术研究以及实践应用的老本,但这种老本已越来越无法吃,也越来越不能吃了,因为这些老本很多已经翻篇,已成为过去式;以为拿了高等教育的学历、评上了高级职称就可以高枕无忧,想依靠原本的努力和付出一劳永逸、一辈子吃老本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在面向未来的世界文化交流互鉴和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在中国公共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在人工智能应用不断趋向深入的时代,公共图书馆面临诸多新的文化传承、新的阅读推广、新的读者需要、新的服务内容、新的功能拓展、新的互联协同、新的业务岗位、新的信息环境、新的使命担当,需要我們通过学习来不断提升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认识水平,从全局视野来进一步提升事业发展境界格局,以初心使命承担起传承文明的接力责任,从读者为本的角度不断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本领。我们需要秉持日就月将的学习理念,将“学不可以已”作为公共图书馆人面向未来的座右铭。在职学习与在校学习有所不同,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助式学习方式,这样的学习,自觉与兴趣就显得十分重要。汉扬雄《法言·学行》:“百川学海而至于海。”^[6]意为百川流行不息,图

书馆员的学习也应当如河川流向大海,日进不还至于大海,培养自己成为适应和驾驭人工智能时代和读者新需要不断增长环境挑战的公共图书馆员。

2. 学问和思辨

学问需要学习、求教和询问。《易·乾》：“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7]而这种学习和询问，都需要我们虚心求教并进行独立的思考和辨析。《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8]这里论述了学问、思辨和笃行的问题，这对于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人而言，都是学习中需要把握的基本理念、重要原则和重要方法。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事业中，有诸多宏观、中观和微观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实践、去思考、去认知。如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不断深入发展的环境下如何进一步加强文献征集保存问题，经典阅读推广如何正确定位并深入推进问题，少年儿童服务中的良好习惯养成和创造力及好奇心激发问题，万物互联的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因馆制宜在服务管理实现可及性问题，市县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如何实现深度均等化发展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员如何加强自身队伍建设问题，如何在新时代进一步完善公共图书馆现代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问题……，对于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我们要有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行之弗笃则决不停止、决不放弃的学习精神。同时，学习和求教的内容应当注重形成系统。因为公共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问，是一个富有逻辑的科学系统，不能停留在碎片化的知识和信息堆砌的层面，而需要在学习思考中从宏观上进行系统学习和思考，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科学联系的知识体系。

3. 学习的场所

“学”也表示学习的场所。《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9]《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8]《广雅·释宫》：“学，官也。”清王念孙疏曰：“谓官舍也。”^[3]公共图书馆既是广大读者学习的场所，同样也是图书馆员学习的场所。在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学习场所中，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和全面更新，学习场所通透、绿色、典雅、宁静的全新设计感，与读者零距离服务的接触感，线上线下多屏融合的互联感，文明元素典雅呈现的文化感，可读可获的便捷感，深度沉浸互动的体验感，个性化与团队学习氛围营造的温馨感等，所有这些正在让公共图书馆的学习新场所散发出生命活力和诱人魅力，正在像磁石一般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进入图书馆、钟爱图书馆，使阅读学习成为广大

读者工作和生活的方 式。而公共图书馆员在未来场所的更新与服务中正可以不断以创新的思维,使公共图书馆的学习场所永葆“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空间魅力和学习活力。

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学习场所与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和岗位设置相关联。学习需要专注。古人为学,自少至老,只定一路,所以有所成就。公共图书馆员在图书馆专业的学习和服务上也应当秉持专精的目标和专注的方法,但需要在此基础上朝着更加广博的方向发展。因为当代的图书馆学正面临跨学科、多领域、边缘创新、多学科协同创新、多行业融合的常态化发展,图书馆岗位正面临多岗位交叉互动更新的变革,这就呼唤公共图书馆员必须形成 T 型的专业知识结构,以适应未来的发展。通过岗位的专精学习为不断创造与创新学习场所添砖加瓦。

(三) 三问学行

1973 年至 1981 年担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刘季平(1908—1987)曾就读于江苏如皋师范学校,从陶行知(1891—1946)问学。陶行知曾在演讲中将明代学者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翻了半个筋斗,改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后又进一步做了“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的生动比喻,提出了“行以求知知更行”的论断,并改名“知行”为“行知”。^[10]刘季平作为陶行知的学生,在学习实践中显然受了老师行知思想的深刻影响,当年无论是刘季平向中央书记处所做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还是其所主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无论是刘季平率团出访欧美学习考察,还是其组建中国图书馆学会;无论是刘季平参加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新馆的研究设计方案,还是其领导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管理服务改革,都深深地打上了学行的烙印,这与陶行知倡导的学行合一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而这也应当成为现在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员学习实践的楷模。在面向未来的图书馆创新发展中,正面临着需要破解的诸多现实难题,也有需要破解的诸多服务与管理中的堵点与痛点,需要我们以学行的理念方法,注重调查研究,注重中国特色,注重因馆制宜,注重实践创新,在公共图书馆的全新实践中追求新知和真理,并运用新知和真理指导、创新并推进全新的图书馆实践。《墨子·修身》:“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11]理论与知识需要在实践中检验,需要在实践中发展,因此,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员不能仅仅是坐以论道,而要主动地、积极地投身于图书馆的实践,并敢于在实践中试错,在勇立潮头中开创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的新境界。

二、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问道

(一) 一问“道”字

“道”字在古文字中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卷二辵部：“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古文道，从首、寸。”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云：“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道之引申为道理、亦为引道。首者，行所达也。……从辵首，道人所行也，故从辵。……从寸者，如九轨、七轨、五轨。”^[2]可见，道的本义是道路，用人所行之道路来表示。由道路引申为方位、方法、技艺以及事理规律等含义。

“道”由道路引申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本原。《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韩康伯注：“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12]《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7]《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朱熹注：“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13]以上这些古代经典中对“道”字的诠释，充分表明了“道”作为“无不由也”和“不可须臾离也”的“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根本作用。同理，在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中，也同样有“道”的根本问题。2019年9月8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之际，习近平给国家图书馆8位老专家回信，指出了国家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八字初心，揭示了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的核心定位、肩负使命和文化功能，^[14]这正是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之“道”。作为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的“无不由也”的“当行之理”，我们需要从“道”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对公共图书馆作为重要容器、重要标志、重要机构等的文化重要标志加深认知，对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教室、精神家园、公共空间等的文化重要场所加深认知，对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平台、赋能神器、主导载体等的文化创新载体加深认知。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中，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道者，万物之所然、万里之所稽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道，正是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的全新历史方位，是未来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我们必须一以贯之的根本遵循。

(二) 二问引导

“道”字本亦作“导”字。清代学者朱骏声认为：古文道字“从首寸，按当为导字之古文”。^[15]《楚辞·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16]故

“导”字有先导、引导之义。在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还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还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化创造;无论是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空间,还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公共图书馆都需要发挥起先导的使命,都应该承担起引导的功能。

“道”也有治理的含义。《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何晏集解引包咸曰:“道,治也。”^[12]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第七个方面正是“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17]在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中,我们应从根本制度、建设制度、保障制度、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五个向度积极创新前行,同时要结合当下与未来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实际,不断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不断推动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的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定型,以进一步构筑起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这正是“道”在公共图书馆当下和未来发展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 三问方法

“道”字也引申有技艺、方法的含义。《周礼·春官·大司乐》:“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汉郑玄注:“道,多才艺者。”^[12]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如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需要我们不断在实践中创新技术和方法。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不断更新迭代的信息技术为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持续赋能,为公共图书馆不断释放出创新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为公共图书馆提高服务力开辟了新方法和新路径。“三网(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六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量子计算)”正在呼唤公共图书馆人与之同频共振。这些新技艺和新方法正在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提供了“导夫先路”的“一切皆有可能”的发展空间,要求我们积极推进外在技术教育与内在道德教育的有机统一,以时不我待的创新敏感性和因地制宜的理性智慧积极主动地把握住这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三、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学道创新

在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学道创新中,要体现出学与道的合力与张力。

(一) 学道并举

对于面向未来的中国公共图书馆而言,学习和道路的两大命题是互相紧密联系,互为表里的。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不仅要注重眼前的目标,而且必须登高望远,注重人类社会发展和整个公共图书馆业务生命周期发展等根本问题。如果没有对公共图书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初心使命的深刻认知,没有对以“三网六技”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所不断释放的巨大推动力和服务力的深刻认知,没有对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规律和特点的深刻认知,没有对所在地区和城乡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深刻认知,要在思想和行动上自觉地融入全球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历史大潮之中,坚持并创新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是难以做到甚至是无法做到的。学道并举,就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探究并把握 170 年来全球和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普遍规律,就要探究并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经验,剖析其中的政府主导、社会覆盖、技术引领、地区协同、社会共创、融入全球的历史逻辑和发展密码,就要在不断学习实践中坚持和完善新时代公共图书馆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同时在丰富多样的实践中进一步促进学习的深入与深化,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性的思考并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总结。因此,学道并举、学道互动是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学道创新所必须秉持的原则之一。

(二) 增强四力

山高人为峰。要实现中国公共图书馆学道创新发展的高峰,需要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员的队伍建设。其中重要的是增强图书馆员的四力。

1. 增强脚力

要深入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实际,亲身感受服务和管理前台的第一手信息,用脚步丈量中国文化大地上的各个公共图书馆,直接体验世界各国图书馆历史的发展逻辑。尽管书本学习和间接经验是十分重要的,但通过脚力在亲身体验的学习中所领悟的公共图书馆发展之道,对脑力、眼力和笔力的影响是不一般的。

2. 增强脑力

《论语·为政》中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8]学习中的独立思考 and 批判精神尤为可贵,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

政策、发展举措、发展技术,都需要在学习基础上的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预见性和储备性的思考,需要通过公共图书馆的智慧大脑加以宏观谋划,中观施策,微观更新。我们可以发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在中国一些经济并不太发达的地区,有些公共图书馆却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就,显现出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勃勃生机,跻身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第一方阵,究其原因,这些图书馆管理者的脑力水平居高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3. 增强眼力

增强眼力就是要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中具有“千里眼”的望远镜能力,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种眼力,需要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全局、面向读者需求的大视野,也需要有大文化、高起点、全链条、新空间、宽格局的大胸怀,还需要有大数据、全媒体、新平台、顺风耳、智能化的大科技,从而在胸有成竹中把握前所未有的机遇,并充满自信地迈向建设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大文化的美好未来。

4. 增强笔力

文以载道。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需要学理探索,需要在问题意识、现实意识、需求导向、目标导向的基础上进行战略问题、公共政策、实践案例的及时分析研判和调研总结,需要对公共图书馆的创新发展所带来的广大读者的文化获得感进行提炼,这就提出了公共图书馆员的笔力问题。而科技普及、文化教育、素养提升,也都需要我们具有深入浅出的全媒体的笔力。在全社会增强公共图书馆意识,让广大公众进一步认知公共图书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样需要我们具有面向社会、跨界传播的神来之笔。

(三) 睿智开新

在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学道创新中,还要睿智开新。这里可以用集、协、加、人等字来具体诠释。

1. “集”字

集,《说文解字》卷四隹部:“集,群鸟在木上也。”^[1]这是一个会意字,从隹从木,表示许多鸟聚集在大树上。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推进广度的集群化、深度的均等化、高度的智能化,需要构建起更大的共知、共建、共享的“大树”平台,让更多的各层次图书馆数据和服务的“群鸟”在“大树”上汇集群,从而提高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效能和效益,提升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现代化的品质和境界。这样的“群鸟在木上”的新平台正是未